

论《边城》的生命形式及其消解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边城》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寄托着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小说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处理得非常模糊,另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空间即环境却处理得异常分明,通过这种特殊的时空处理方式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生命形式。这使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同时,在《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模式,这表明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

关键词:《边城》;沈从文;生命形式;人性;时空关系;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3-0342-05

一

对人性美的追求与抒写,对理想生命形式的审美观照,贯串在沈从文几乎所有的创作中,使其创作从总体上呈现出“人性神庙”的风貌,这成为沈从文创作最鲜明的标志。1934年发表的《边城》在沈从文的整个创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寄托着沈从文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在艺术上也臻于化境,代表着沈从文创作的高峰,标志着其“人性神庙”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1]。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指出:“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一个小城小市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2]沈从文的这个创作意图在《边城》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边城在沈从文的笔下不仅充满葱茏的诗意,而且包容着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化符号的性质,代表沈从文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理解与追求。边城作为一个文化隐喻与象征,其意义指向固然是多维的,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不同的读者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会发现其不同的

意蕴,但边城的意义基点还是具有相对的确定性,指向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理想的人性形态。同时,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在现实中却以幻灭的形态出现,具有一种无法避免的宿命性悲剧意味。边城所代表的理想生命形式及其消解,早已超越边城乃至湘西狭隘的地域边境,具有广泛的人类意义,因此,边城已经成为一种理想生命形式与理想人性的指称,具有一种类似于桃花源式的文化符码意味。

二

《边城》对时空关系的处理非常特殊,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处理得非常模糊,另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空间即环境却处理得异常分明,往深层看,这种时空处理方式又与作品所表达的理想人性与理想生命形式密切相关。先来看《边城》对时间的处理,沈从文对此是颇费心机的。边城故事发生的时间虽然大体上有个限定,但却有意处理得相当模糊,使人感觉到这一故事似乎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因此,这一故事既具有“过去时”的痕迹,带有回忆与梦幻的性质,却又似乎不无“现在时”的某些回音,流露出作者对现实的深沉喟叹。读者很难明确地指出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一时期,尽管在作品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时间线索,然而这些时间线索本身也似乎具有不确定的性质,很容易使人怀疑这些时间线索的真实

收稿日期:2005-12-30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吴投文(1968-),男,湖南郴州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性。也许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在时间的不确定性中寄予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使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具有某种永恒的性质。这种在时间设置上“过去”与“现在”的交叉与融合,既使人感觉到故事与自己具有某种贴近性,却又产生一种间离化的审美效应,因而故事中的人物也似乎生活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既与读者有相亲近的一面,仿佛能触摸到他们的声音与气息,又与读者有相疏离的一面,仿佛生活在读者的想象与梦幻中,呈现出一种抒情性的忧郁气质。这样,对时间的这种模糊化处理使故事传达出一种浓厚的牧歌情调,在牧歌情调里显示出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以及这种理想的最终破灭所引发的苍凉与忧郁。同时,这种时间处理方式能有效地表现出老船夫、翠翠等边城人物的悲剧命运与人生孤独感,并“通过生命的不确定性挖掘出人性中更普遍更闪光的美——一种带永恒价值的并永远具有确定性的人生内容——人性美”^[3]。显然,对时间的这种模糊化处理,不仅可以产生陌生化的审美效应,有利于增强作品的牧歌情调,而且可以使作品表现出来的理想人性与理想生命形式具有普遍性意义,这种理想人性与理想生命形式既存在于读者无法经验的“过去”与“未来”,也存在于读者可以经验到的“现在”,换言之,这种理想人性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眷注。这种理想人性就是沈从文所说的“‘共通处多差别处小’的共通人性”^[4],这种共通人性并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而是具有某种恒定的性质,正如沈从文所说的“生命流传,人性不易”^[5]。因此,这种对时间的模糊化处理方式实则传达出沈从文“人性皆善”的生命理想,充盈于边城的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就是这种生命理想的表现”。

与沈从文对《边城》故事发生时间的模糊化处理相反,他对《边城》空间即环境的处理是极其清晰的,像他的许多作品一样,他把故事发生的环境设置在自己的故乡湘西。这种环境设置同样传达出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边城》中所展示的生命形式带有类童年时期天真与淳朴的气息,在沈从文看来,这种类童年时期的生命形式还留存于自己生活过的湘西乡土,因此,《边城》具有如真如幻的色彩,兼有造梦与写实的性质。《边城》中的茶峒实有其地,位于川湘交界处,作品开头对此有明确的说明:“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条官路通到湘西边境“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因

此,就地理环境而言,边城其实就是湘西的指称,后来湘西被称之为边城,应该归功于沈从文的诗意思象。边城虽实有其地,但寄意遥深,边城之“边”固然是指地理之边,处于川湘交界处,但其寓意还可以理解为文化之“边”。而理解为两种人生形式的“界域”似乎更为恰当,也就是说,边城之“边”乃是指两种人生形式之“边”,一种是沈从文热切向往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一种则是人性异化的人生形式,因此,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边城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远离都市文明的乡村小镇。边城的人民都具有淳朴善良的品性,他们生活在古朴、宁静、和谐、美丽的大自然里,承受着自然的熏陶,舒展自由的人性,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中。《边城》开头三章集中笔墨描绘边城的山水图画与风俗习惯,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边城生活风貌,浸染着浓郁的牧歌风味,然后自然而然地叙述边城发生的人事纠葛,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也都如山水般纯净美好,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对理想人性与理想生命形式的弘扬及其生命寄托。

因此,边城环境的牧歌性是与边城美好的人生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边城的人生形式表现为一种诗性人格,边城环境的牧歌性表现为一种诗性自然,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凸显出边城人民人生情感的朴素与观念的单纯,边城中的人物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与自然合一的诗性人格与自然气质。翠翠是沈从文寄托最深的人物形象,在她身上凝结着自然山水的灵气,显示出天然纯真的自然气质。翠翠与爷爷相依为命,终年帮助爷爷接送过渡的来往客人,除此之外,她与其他人较少接触,因此,就社会关系而言,她是极其简单的,受社会的影响也就较少,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精灵。小说在描写翠翠时,主要是从自然气质的角度去展示她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情绪,突出她与大自然、与青山绿水的相容性,从中显示出她的自然人性之美与内在的神性之美:

翠翠在风里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畜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在翠翠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

然的人性美,其性格发展与生命状态都建立在这种自然气质的基础上,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屈原《九歌》中的山鬼。山鬼为自然之神山神,从屈原作品对其服饰、姿容和感情的描写来看,为一美丽绝伦的女性,或说为巫山神女。她满怀痴心地等待所爱之人,然而他不来,因此她陷入孤寂与迷惘之中,翠翠的命运似与山鬼有相似之处,也在满怀痴情的等待中充实生命存在的意义,她们的生命形式都表现出爱与美的高度统一。《九歌·山鬼》中有这样的句子:“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不难发现,翠翠在自然气质上与山鬼有神似之处:伫山之阿,倚水之唇,自然、清丽、纯情、忧郁。她们都是自然山水间的精魂,生于自然又寄情于自然。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的《箱子岩》一文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屈原如果不被放逐到湘楚这样充满“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两千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文章”^[6]。同样地,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也只能孕育于湘西这样神奇而充满牧歌性的地方,在翠翠的身上集中地表现出湘西生命形式的优异品质与诗意内涵。翠翠对爱情始终如一的执着与期盼,完全是出自自然本心和质朴美好的善良天性,她不急不怒,也不怨天尤人,而是顺乎自然地等待属于自己的爱,是那样的执着与深情。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翠翠既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又表现出某种抽象性质,在她身上凝结着一种高度象征化的意蕴,她对爱情的忠诚、执着,对大自然永远充满童心般的爱恋,都代表着人类对自然与童心的珍爱与眷顾,对人性美的追求与向往,在翠翠的身上寄托着沈从文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爱与美的生命理想。

老船夫的身上洋溢着淳朴厚道的人性美,凡一切传统美德,在他身上似乎都不缺少。他管理渡船五十余年,不管是风吹雨淋,还是寒来暑往,他都忠实于自己的职责,认为这是自己本分的事情,从不松懈。渡船为公家所有,过渡人都不必出钱,但总有人心中不安,就抓一把钱掷到船板上,然后匆匆离去,老船夫必一一拾起,吵架似的塞到那人手心里去,实在推却不过,就用这些钱买来茶叶和草烟,草烟慷慨地送给过渡的行人,“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随意解渴”。他有事到城里去,必把他的酒葫芦送给相识的人喝个够。他买肉,屠户不要他的钱,他就把钱事先准备好,掷到屠户的钱袋里去。老船夫对翠翠婚事的隐忧,对老老二老兄弟的暗示,对老马兵和团总媒人的探问,都体

现出他对外孙女的深切关爱和一丝醇厚可亲的狡狴,这些都显示出他的宽厚仁爱。老船夫是纯朴民性的集中体现者,他对待钱财的态度与为人处事的方式,体现出一种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浸染下的理想化人性形态,代表一种符合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命形式。

船总顺顺是地方上有身份的人物,也是一个像老船夫一样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人物,不过他的美德似乎带有更多侠义的成分。他有大小四只船,在当地算是一个小业主,对待钱财却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因此深受当地人的尊敬,被推举为“首事人”,为乡亲邻里排忧解难,调解纠纷。顺顺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极其严格,要求两个儿子做任何事情都要“甘苦与人相共”。尽管老船夫和他贫富悬殊,地位殊异,但他把老船夫当做自家人一样看待。当老船夫猝然离世后,他放下心中对老船夫的一丝埋怨,积极为老船夫筹备丧事,对翠翠的关照也无微不至。在顺顺的身上处处表现出淳朴、仁厚的狭义品格,显示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性美,这正是沈从文所着力歌颂的一种生命形式。

在边城年轻的一辈中,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二老傩送都表现出雄强健康的人性美。“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不仅如此,兄弟两人都具有美好的品格,“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因此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博得当地人的尊敬。他们都喜欢翠翠的聪慧、质朴与善良,而对她们有没有身份与陪嫁毫不在乎。在兄弟两人同时都爱上翠翠的尴尬情形下,“兄弟两人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但也不作兴有‘情人奉让’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的可笑行为。”于是,他们相约用当地流传下来的对歌方式去求爱,谁先得到回答谁就得到翠翠的爱情。大老天保不善于唱歌,轮到大老时就由二老代替,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他们都从自己内心的情感出发,热烈地追求自己的所爱,在他们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湘西儿女的生命之美与人性之善。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呈现出乐园图式,这种乐园图式“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社会习俗,乃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7]。在边城便是作娼妓,也不失人性的本真,“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耻辱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沈

从文笔下的边城不只是构成一幅美的山水图,更重要的是人物美与人性美,构成一幅桃花源式的乐园图,这里没有世俗观念的约束,男女老幼皆和睦亲善,这些情形正如李健吾所指出的,“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都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8](55)} 沈从文一方面通过有意淡化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通过大肆渲染边城环境的原始状态与自然气息,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生范式。在这种人生范式下,人性美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形式,《边城》就是对这种生命形式的集中展示,是一曲理想生命之歌。

三

概括地说,边城人民的生命形式以人性美为基本内涵,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表现为诚与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不坦诚相待,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轻利重义、守信自约的道德操守。不管是酒家屠户,还是来往渡客,都表现出成人之美的利他品质。至于小说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更是莫不如此,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其二表现为美与爱。主人公翠翠无疑是美与爱的化身,她天真善良,温柔纯情,与二老傩送一见钟情,在傩送出走后,在渡口痴情地等待着他归来。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老船夫的淳朴厚道、天保的豁达大度、傩送的笃情专一、顺顺的豪爽慷慨、杨马兵的质朴热诚,都无不表现出“美”与“爱”的人性内涵。至于边城的自然山水之美、人事调和之美、人们的恬静心态之美,也都与爱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通过对边城人民“美”与“爱”的描写,沈从文从他们的身上挖掘出一种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格美、德性美与灵魂美,这使边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人性善的符号,边城人民的生命形式成为一种理想化的生命形式。其三表现为人性与神性的内在统一。《边城》在对人性美的表现上,存在着一个双重层面的有机结合,也就是显性的人性层面与隐性的神性层面的结合,自然人性与自然神性的结合。沈从文说:“美国无所不在,凡属造型,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

可见出其精美处与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本体’中的认识。”^{[9](377)} 在他看来,理想的生命形式是“美”“爱”“神”的三位一体,代表“一种美与爱的新的宗教”^{[9](379)}。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正是边城人民的生命形式,在边城人民的身上既表现出与自然契合的人性之美,又表现出更具超越性的神性之美。边城的人们不仅性格单纯,而且信仰也极为单纯,但在这种单纯之中又显示出神性的光辉,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出“生命神性”与“生命庄严”的人性内涵。

然而,在《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模式,这表明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边城》中发生的一系列死亡事件,似乎都具有偶然性,往往不为人注意,实则这些死亡事件在边城是极其重要的事件,构成《边城》悲剧感的主要来源,也从一个更深的层面彰显出边城的人性美与理想生命形式,及其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必然衰落的结局。这些死亡事件构成一个关于理想生命形式消解的隐喻,在这一隐喻中寄托着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及这种理想最终在现实面前破灭时难以言说的内心哀痛,这使《边城》产生一种浓重的人生空幻感和挽歌情调,作品中始终潜隐着哀婉的气息。小说中共出现过三次死亡事件,这三次死亡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实则具有深层联系,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这三次死亡事件的总根源是翠翠父母的自杀身亡。翠翠的母亲和一个青年军官恋爱,但却不能自由地结合,于是双双殉情而死。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死并非不可避免,至少他们还可以选择逃走,而实际上却无法逃脱良心与责任的重负,因为一个不能不对军人的荣誉负责,一个不能不对自己孤独的父亲负责,他们最终选择死亡乃是为维护生命的尊严,死亡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命形式。沈从文把他们的死亡极度诗意化,在诗意的氛围中展示出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然而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终究含着乌托邦式的虚幻色彩,因而只能以悲剧作为结局。翠翠父母的死产生连锁性反应。老船夫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孤雏的责任,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以避免自己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正因为如此,老船夫在翠翠的婚事上就总是显得那么犹豫、小心,“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老船夫的这种谨慎又导致天保

遇难身亡,天保之死又使老船夫和顺顺之间产生误会,并导致傩送的出走,这又影响到翠翠的婚事,最终使老船夫在深重的内心隐忧中离开人世。在这一连串死亡事件中,谁都没有过错,然而得到的却都是悲剧性的结局。在这种悲剧性结局里却又显现出人性美的动人光辉,从一个更深的层面展示出边城人民具有神性色彩的生命形式。李健吾指出:“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推进,而且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18][56]}死亡事件通向《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彰显出边城的理想生命形式及其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由此形成《边城》乐园图式与挽歌图式的双层结构,这种双层结构又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意义体系,使《边城》具有丰富而复杂的象征意蕴,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参考文献:

- [1] 凌宇. 沈从文传[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 [2] 沈从文.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A]. 沈从文文集(第11卷)[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 [3] 凌宇. 在历史真象与理论阐释的夹缝之间——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A]. 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C].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 [4] 沈从文. 小说作者与读者[A]. 沈从文全集(第12卷)[C].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 [5] 沈从文. 看虹摘星录·后记[A]. 沈从文文集(第11卷)[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 [6] 沈从文. 箱子岩[A]. 沈从文文集(第9卷)[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 [7] 刘洪涛. 〈边城〉与牧歌情调[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1): 78.
- [8] 李健吾. 〈边城〉[A]. 李健吾批评文集[C].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8.
- [9] 沈从文. 美与爱[A]. 沈从文文集(第11卷)[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On life form and its dispelling of “*The Remote Town*”

WU Tour-w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Remote Town*” strongly displays Shen Cong-wen’s ideal life, in which he implied his earnest expectation of the ideal life form. In the novel, the time when the story occurred is extremely vagu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ace or environment of the story is particularly distinct. The novel establishes a kind of ideal life form through this special way in dealing with space and time, which makes the town a perfect symbol of his ideal. Meanwhile, there is a pattern which dispels the form of ideal life in the inner significant structure. This indicates the inexpressible and contradictory psychological state, which also reveals the fact that Shen Cong-wen who wavered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reality.

Key words: *The remote town*; Shen Cong-wen; life form; human nature; the relation of space and time; dispelling

[编辑:苏慧]